

北京口述历史

定宜庄 主编

城墙之外

定宜庄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出版社

北京口述历史

# 城墙之外

定宜庄

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城墙之外 / 定宜庄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出版社,  
2017. 2  
(北京口述历史)  
ISBN 978 - 7 - 200 - 12288 - 6

I. ①城… II. ①定… III. ①北京市—地方史 IV.  
①K2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60753 号

北京口述历史  
城墙之外  
CHENGQIANG ZHI WAI  
定宜庄 著

\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 
北京出版社  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：100120

网 址：[www.bph.com.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  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 
新华书店 经销  
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21 印张 290 千字

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0 - 12288 - 6  
定价：7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本社负责调换  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 - 58572393



# 历史



# 总序

在这套《北京口述历史》丛书中，我想通过 80 余名老北京人的口，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，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。

通过人、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，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、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，是我近 20 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，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，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，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。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，才具体地、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，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，才一步一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，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、灵魂和神韵。<sup>①</sup>

既然我的宗旨是从“人”出发，所以本套丛书的 5 卷，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。然而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，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，便是不同的人群，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。或者说，在 1949 年以前，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，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，各自具有鲜明的、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，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，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，以及城中的居住者——北京人。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。可以肯定地说，这样的

<sup>①</sup> 需要说明的是，我做的北京人访谈，尤其是深入访谈，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《北京口述历史》丛书之中。最近几年，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《宣武区消失之前》《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》《大历史·小人物》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，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。此外，对常人春、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，也正在编辑之中。

几个区域，在北京缺一不可，但无论哪一个区域，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“精华”，哪一个区域，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。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。

我说的这几个区域，大分起来，就是内城、外城和城郊三部分。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，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，尤其是将宣武、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、东城两区之后。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，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，外城住汉回商民、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。至于北京城郊，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，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，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。

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，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，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，这便形成了5卷。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，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，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。具体地说，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，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，我一味去寻找的，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“老北京人”标准的那些人，而这样的人，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。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，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，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，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，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，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，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，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。

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，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，此处不再详细说明。总之，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5卷本的丛书，既各自独立成编，围绕的又是同一个城市、同一个主题，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。

本书是在我2009年出版的《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》的基础上，经

过大量补充修订而成的，事实上，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，而可以看作是另一套书了。

首先，此次将这套丛书分为 5 卷，有了可以伸展补充的余地，遂得以将一些尚未发表过的访谈成果收入，究其分量，占全套丛书的三分之一以上。这些访谈成果包括两类，第一类是在《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》出版之后所做的部分访谈。自《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》出版，距今已经过去整整 6 年，但我寻找老北京人并为他们做访谈的工作却迄未间断，这些后来做的口述在访谈宗旨和方式等方面虽然与此前基本一致，但在对“北京人”的定义上，则不得不有所放宽，那就是将原先把“北京人”限定在“民国之初（1911 年前后）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”一条，推迟到了 1949 年前后，也就是说，凡是 1949 年前后进入并居住于北京的人，便都被纳入到我的访谈对象中。做这一修改，有众所周知的原因，那就是随着时间的飞速流逝，即使以 1949 年画线，按被访者当时 18 岁计，如今 67 年过去，也已经是 85 岁的耄耋老人了，抓紧记录他们的历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。更何况，1949 年前后是新旧政权交替，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、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创立并生长的年代，本身也包含有极其丰富的内容。另外，正是由于放宽了对“北京人”标准的限制，我得以将此前曾经做过，但因不符合这一标准而未收入的访谈，也纳入到了此书之中。

其次，在编撰本套丛书的过程中，让我最感慨也最有收获的，并不是在量上的增加和内容上的添补，而是去寻找多年前的被访人，并对他们所做的回访工作。由于历经数年甚至十数年，仍然在世的老人已经不多，这样的回访便尤显珍贵。通过回访，补充和修订了初次访谈时未曾顾及的细节，加深了我对原来访谈的内容和被访者的理解，更凸显了访谈的意义。更有意味的是，有些被访者与我在这十数年间从未中断联系，有些已经成了朋友和“自己人”，而我们相互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交流，最终能够进入较深层次的主题，这一过程或如曲径通幽，或如层层剥笋，正与史家所做考据的过程相似，其间的艰难与乐趣，很难

用言语表达出来。还有一些被访者已经逝世，但当我看到他们最终结局的时候，再回想他们当年访谈时的情状，其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，也颇令人感叹唏嘘。总之，通过此次回访，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深度访谈对于口述史的重要性。

再次，是对部分口述，从文献上下了些钩沉索隐的功夫。一方面附上相关的档案材料以资考订佐证，一方面在注释上做了大量的补充，力图将口述背后的故事，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。总之，一个具有职业性好奇的史家，当他面对躲藏在自己访谈对象背后的，远比口述者闪烁其词的、语焉不详的甚至漏洞百出的讲述更为精彩、更为深沉的真相时，很难就此止步。即以唐德刚先生为胡适所做口述为例，胡适为唐先生讲述的，仅仅是胡适那复杂丰富一生的冰山一角，如果不将隐没在水中的那更大的部分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，人们并不能知道这座冰山是什么样的；而这正是负责任的史家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。如果再深入一步，那么这座冰山所露出的部分为什么是那个样子，就更值得史家去探究和分析，而这，往往就是对某个具体个人所做访谈的最大意义所在。

辛亥革命迄今百余年，北京城的鼎革，用天翻地覆形容毫不夸张；1949年以来的变化，较之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更甚；而改革开放之后，或者就以《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》出版迄今的短短6年来说，变化之巨大，竟然又超过了以往的百年，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、目不暇给的程度。如果说民国时期的鼎革更多表现在社会的变迁上，1949年以后是对城墙、古建等物质文化的损毁，那么近年来的这一变化，则是因为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导致的“老北京人”的消失。说消失也许并不准确，准确的应该是，当北京人口已达数千万的今天，区区百万的老北京人，早已湮没在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众人之内。尤其是随着京城大规模的改造拆迁，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搬离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，散落于城外诸多新建的小区之中，以北京的“人”为载体的京城文化，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。甚至被老舍先生誉为世界上

最优美动听的“老北京话”，如今也难以听到了。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，这场“人”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，同时，也最令人触目惊心。

所以，这套《北京口述历史》丛书，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，所做的最后一瞥；是我对这个正在急速沉没的城市，留下的最后一个纪念。

作者谨识

2016年2月

# 序言

本卷中各篇访谈的被访者，都居住于北京城的郊区，也就是北京城的城墙之外，所以我以《城墙之外》为本卷口述命名。

不过，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，这里说的京城郊区，指的并不完全是北京市郊现辖的行政区划。如果约略言之，在北京的城墙未被拆毁以前，城墙之外就是城郊；在城墙被拆毁之后，郊区一度曾指二环路以外。事到如今，城里城外的概念已经越来越模糊，三环之外有四环，四环之外有五环，五环之外有六环，环环相扣，也许不再有止境，通州、房山不是都已经与海淀、朝阳一样称“区”了么。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人们还常常挂在嘴边的“进城”“出城”等词汇，不知不觉间就已不再使用了。总之，清朝灭亡已近百年，北京城郊的界限一直处在变化和扩大之中，但详叙这一沿革，并不是这本口述史的事。所以，我这里所谓的城郊，可以简而又简地一言蔽之，就是与城墙以内的这座城市关系特别密切的“城外”。当然，即使这样，这个“城外”的范围也过于广阔，我其实只是在这些地方选择了几个零星的点，或者说，就是选择了几个人。而这些人，并不像人们想当然地以为的那样，是“农民”“乡下人”，从他们自己甚至再上溯到他们祖上，往往都不是农民，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，在 1949 年之后曾被划入农民户口。

本来，对于一部讲述北京人的口述史来说，仅仅城墙之内的百姓生涯，已经足够完整，足够独立成篇，而我之所以还要冒画蛇添足的危险，在城郊选择几个点和一些人，而且专列成编，是基于这样的考虑：

北京的城郊虽然也以耕地农田为主，却不是一般人们想象的农村，

而有着与城市息息相关的特性，尤其在城市与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之间的、围绕城市的地段，那是城市的延伸，是城市的边缘，也就是说，是城市这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在这个地段内，生活着大量与城市生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口，对这些人和他们与城市的联系，我会在下面的部分一一展示出来。再者，城内与城郊的边界，本来就不是固定和绝对的，城郊的外来人口，有一天会成为城里人，城里人也会因贫穷或其他各种原因迁居城外，这是一个川流不息、生生不已的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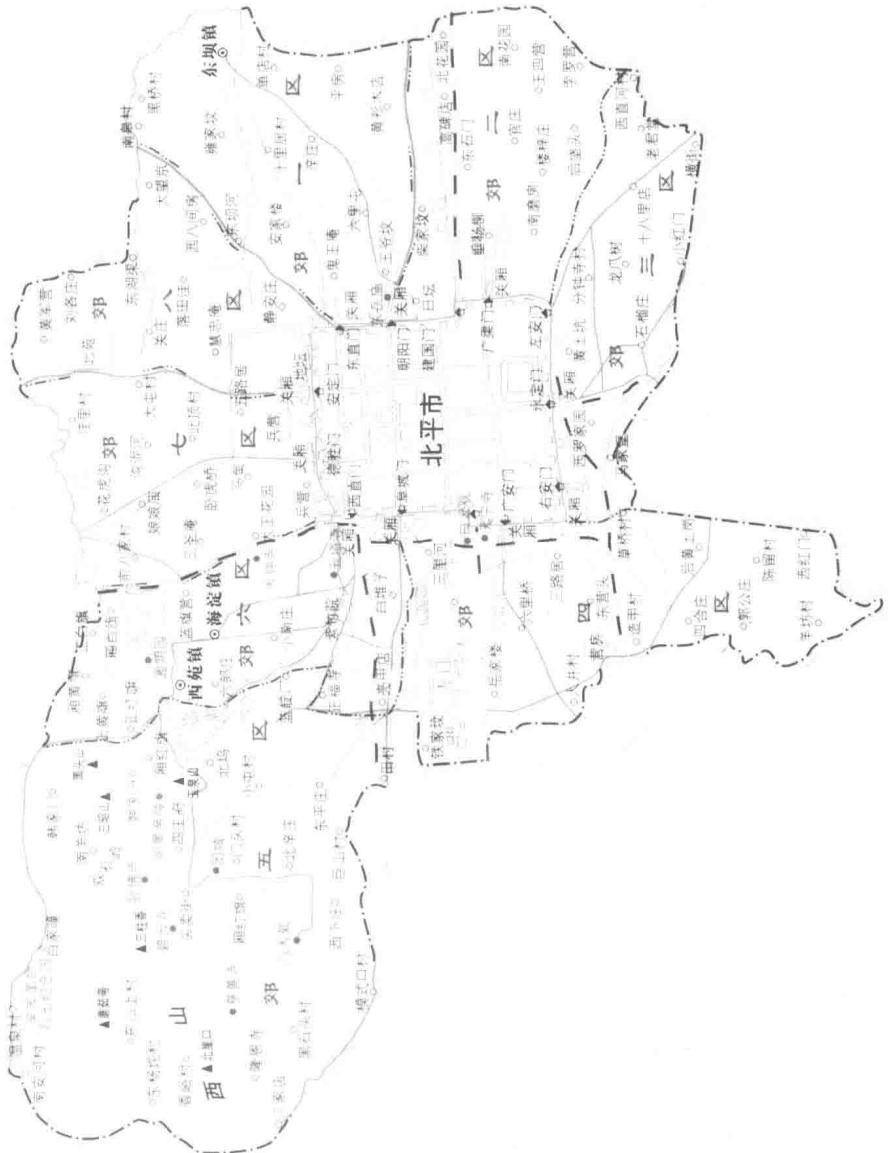
不了解城郊，对城市的了解就不可能是全面的，多年来对于京城郊区的研究，虽然也受到少数学者的注意，<sup>①</sup>但从整体上说，还几乎是完全的空白，这也曾影响到我对北京城郊的认识。在这里，我选择的虽然只是区区几个点，但这些被访者给我讲述的故事，已经使我对北京城郊的了解，有了与以往很大的不同。

我选择的这几个点，以位于京城西北郊的居多，这有客观与主观的原因。从客观上说，由于清代皇帝活动的另一个中心——圆明园就位于京城西北的海淀，这一带确实较其他地带与城内的关系更紧密、更引人注目。从主观上说，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对这里更熟悉、更有人脉，也更觉亲近。而对京郊其他地区，有很多我至今仍很陌生。总之，北京的城郊，是个太大的题目，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来说，这只不过是个连正式的开始都算不上的尝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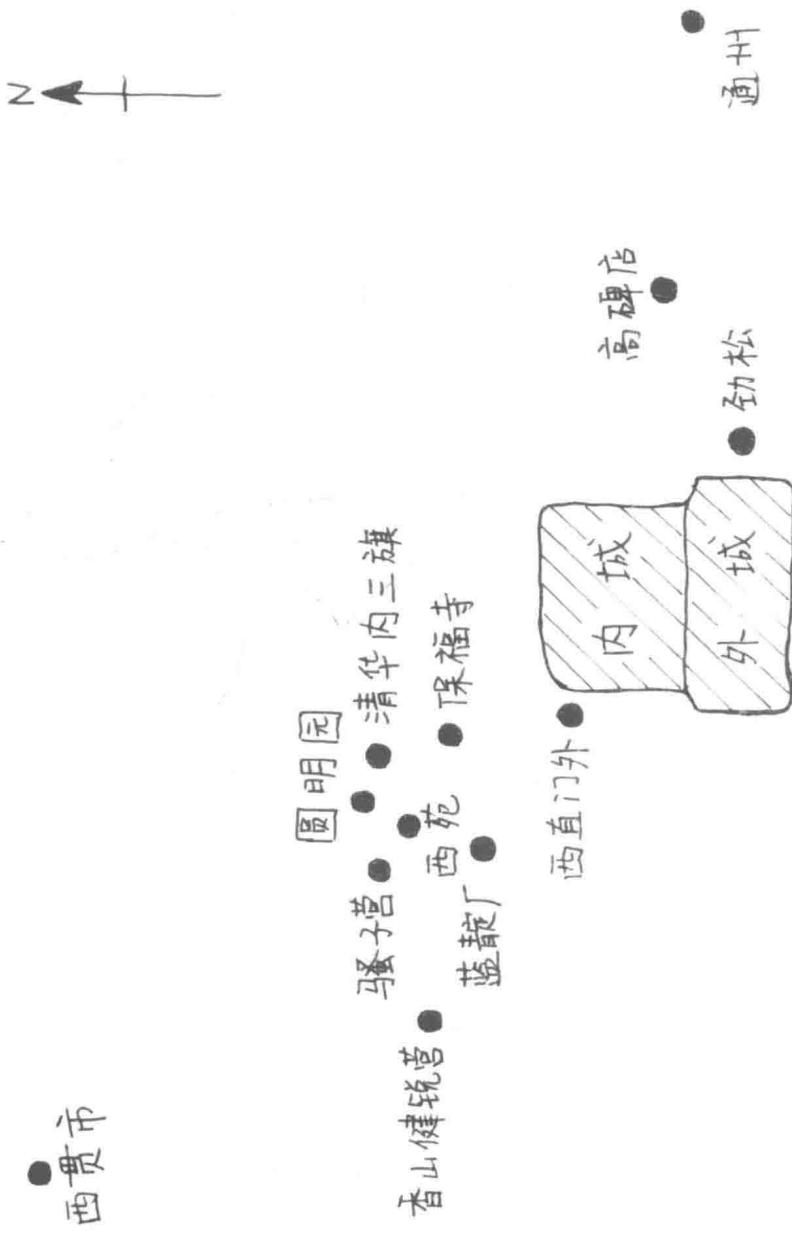
---

<sup>①</sup> 我见到的，如尹钧科先生著《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）和相关的几篇论文。但作为国内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，却似乎仅此而已。

附图一：民国郊区图



附图二：访谈样本分布图



# 目 录

序言 / 1

一、那条进京的古粮道——刘子扬口述 / 1

二、从架松到劲松 / 28

    (一) 白四口述 / 31

    (二) 关俊民口述 / 46

附录 历代肃亲王世系简介 / 75

三、“勤行”的手艺——张强口述 / 77

四、坟户春秋——何淑玉口述 / 93

五、清华园边“内三旗”——司文琴口述 / 100

六、大有庄与骚子营——赵颐口述 / 118

附录 到沙漠上来了一直没受罪——白惠民口述(片断) / 128

七、蓝靛厂边清水河 / 138

    (一) 我就在这儿生这儿长——胡福贞口述 / 139

    附录一 胡女士唱的民歌民谣 / 160

    附录二 赵之平：我这一辈子(我的幼年时代)

        初稿(节选) / 162

    (二) 蓝靛厂几代回民之后——金宝琴口述 / 169

八、健锐营走出来的八旗后人——吴淑华口述/ 203

九、圆明园变成废墟之后/ 217

(一) 李中信、陈克明口述/ 217

(二) 王佟生口述/ 233

十、西苑一条街/ 254

(一) 周桂芳口述/ 255

(二) 高淑瑞口述/ 277

十一、京北回族第一村——黄炳成、李守勋口述/ 298

后记/ 321

# 一、那条进京的古粮道——刘子扬口述

第一次 时间：2002年9月19日

地 点：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

访谈者：定宜庄、张莉

第二次 时间：2014年7月3日

地 点：从北京到通州

访谈者：同上

[访谈者按] 在铁路铺设之前，漕运是京城的命脉，漕粮由运河运抵通州，再从通州运抵北京。早在乾隆末年，从朝鲜出使中国的朴趾源，就在日记中描绘过从通州到北京一路的繁盛景象。他写通州：“天下船运之物皆凑集于通州。不见潞河之舟楫，则不识帝都之壮也”；“既入东门，至西门五里之间，独轮车数万，填塞无回旋处。遂下马，入一铺中。其瑰丽繁富，已非盛京、山海关之比矣。艰穿道路，寸寸前进。市门之扁（匾）曰‘万艘云集’，大街上建二檐高楼，题曰‘声闻九天’……”他写从通州到北京的运粮道：“自通州至皇城四十里间，铺石为梁，铁轮相搏，车声益壮，令人心神震荡不宁”。<sup>①</sup>

这样的场面，直到清末也没有太大的改变。那年年月月周而复始的推独轮车的苦力之中，有一个应该就是刘子扬先生的爷爷吧。他们从山东顺着运河北上通州，然后又从通州顺着运粮道进入北京，最终在北京

<sup>①</sup> 朴趾源著，朱瑞平点校：《热河日记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，104—106页。

扎下根来。到刘先生的父亲一辈已经与北京的旗人通婚。他认为他的母亲和妹妹，都已经是典型的“满族姑奶奶”了。不过在这篇口述中，最生动的还是那个推独轮车的爷爷，这是由孙子讲述的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爷爷的故事。

我对刘先生的访谈进行了两次。第一次是在他曾任职 30 年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办公室。第二次是他应我的请求，带着我一起从朝阳门外的关东店开始，走那条著名的古运粮道直到通州，走过当年他爷爷背粮食的运河河岸，以及潞河医院、复兴庄等他的爷爷、父母以及他自己童年和少年时生活过的地方。这实在是一次非常难忘的行程。

沿着大运河进北京，这是当年山东等省贫穷百姓入京的主要路线之一，刘子扬的祖上如此，后面还要谈到的周桂芳等人的祖辈也是如此。所以本书就从通州的运河开始，再由东向西地展开吧。

刘子扬，1931 年生，1960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档案专业，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，即今天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，从事明清档案的整理、编辑和研究，1991 年 10 月离休。



2002 年刘子扬在办公室  
(本人提供)

[我与刘先生去通州那天，是从朝阳门地铁站出发的，一出发就先经过南营房，所以他就从南营房讲起，引录于此，可以与拙著《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》(上编) 中关松山老人的口述衔接。]